



环境政治学译丛

欧洲执政绿党

Green Parties in National Governments

[德] 斐迪南·穆勒-罗密尔

托马斯·波古特克 主编

郇庆治 译



山东大学出版社
Shandong University Press

环境政治学译丛

欧洲执政绿党

Green Parties in National Governments

[德]斐迪南·穆勒—罗密尔

托马斯·波古特克 主编

邰庆治 译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洲执政绿党/(德)穆勒—罗密尔,(德)波古特克
主编;郇庆治译.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1
书名原文:Green Parties in National Governments
ISBN 7-5607-2905-3

I. 欧…

II. ①穆…②波…③郇…

III. 绿党—对比研究—西欧

IV. D756.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2318 号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邮政编码:250100)

山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7.625 印张 193 千字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定价:16.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总 序

在当代世界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问题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已被公认为是 21 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富有挑战性的难题之一。传统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生产生活方式的反生态本质或不可持续性特征已暴露无遗,而同样清楚的是,在从根本上改变智力支撑着现时代的物质主义生存方式的现代化思维模式之前,人类很难找到一条通向明天的现实道路。因而,人类自从进入文明时代以来,从未像今天这样需要挖掘与展现我们的理论反思潜能:通过重新思考我们与周围自然世界的关系特别是人类作为其中一部分而不是主宰者所应担当的适当角色,来重新构建一种可以使人类长久地在地球上生存的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正因为如此,我们不仅需要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意义上的生态学或“科学生态学”,而且需要(如果不能说更需要)人文与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生态学或“人文生态学”。沿着上述思路,我们才能正确理解正在蓬勃兴起的、人文与社会科学视野下的大量边缘性与交叉性新学科的意蕴,比如生态伦理学、生态哲学、生态经济学、生态营销学、生态社会学、生态人类学、生态文化学、生态法学、生态文学等等。就此而言,笔者所指称的

环境政治学或生态政治学也是这些诸多正在形成中的新兴学科之一。

环境政治的研究在欧美西方国家主要集中在生态政治理论、环境运动团体和绿色政党三个层面,但从更一般意义上说,环境政治还可以包括更为广泛的内容,比如民族国家政府的环境管治及其政策决策、环境政府间和非政府间组织的跨国环境管治合作及其全球政治参与,等等。因而,从总体上说,环境政治学或生态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还远未成熟,从研究对象到研究方法都需要做深入的研究。

部分是基于环境政治学这门学科本身所具有的不成熟性,部分是基于对人类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自身与时代特点的理解,笔者并不主张急于对环境政治学做出看似明确而实际上很可能制约其发展的界定,而是更愿意将其宽泛地规定为一种政治学视野下思考生态环境问题的新视角。具体而言,这包含着两方面的含义:其一,环境政治学可以大致地规定为介于政治学与生态学之间的一门交叉性、边缘性新学科。依此,我们可以不必像对待传统学科那样过分在意它的学科独立性或“名分”,而是给予其充分的自由扩展与深化空间,这样可能反而更有利于它的学科发展与成熟。其二,由于生态环境问题明显是一个超出了单一传统学科研究对象归属的“超普遍性”和影响到人类基本价值认知的“深层次”问题,因而,只有以一种超越传统哲学与政治学框架的视野与开放性才有可能突破原有认知与思维模式的局限,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环境政治学或生态政治学。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反灰色的都是绿色的。

基于上述认识,笔者认为,环境政治学在中国发展的切入点或突破口应着眼于以下两点:一是要坚持研究方法上的比较政治学观点或方法。这其中既包括不同学科视野下对生态环境问

题研究的比较,也包括世界不同地区环境政治学理论与实践的比较。对于前者来说,对生态哲学研究已有成果的消化吸收是其他生态环境问题相关学科包括自然科学学科的理性元点,环境政治学也不例外;对于后者来说,我们并不认为欧美西方国家掌握着人类通向绿色未来的真理或“锁钥”,也不认为中国可以回避作为一个当今世界最大现代化进程中国家的历史责任与创造潜力,但的确认为,只有对欧美国家社会与经济生态化发展经验的分析借鉴才有可能成为任何绿色文明与社会创建的现实起点。二是要争取在研究成果上尽可能广泛而及时地交流与分享。这其中一個基础性的手段当然是有选择地翻译介绍欧美西方国家学者在环境政治学领域的经典性论著,而它对于环境政治学理论与方法在中国的普及和中外学者学术交流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

编辑出版“环境政治学译丛”是在上述两方面意义上的一个尝试,目的是推进环境政治学在中国的起步与发展。在这第一辑中,笔者选择了生态政治理论方面的《绿色政治思想》(安德鲁·多布森著)和《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戴维·佩珀著)、环境运动团体方面的《西方环境运动:地方、国家和全球向度》(克里斯·卢茨主编)和绿色政党方面的《欧洲执政绿党》(斐迪南·穆勒—罗密尔和托马斯·波古特克主编)。这些著作作为一个整体可以集中展示欧美环境政治学的主要方面,而它们之所以被选择,是因为它们构成了在各自领域中迄今为止最为出色的研究成果之一。

当然,如果没有如此多研究基金、学术机构和国内外同行所提供的帮助与鼓励,《环境政治学译丛》的编译出版是无法想象的。由于分别受“中欧高教合作项目”(The EU-China Higher Education Cooperation Programme)、“德国学术交流中心 香

港王宽诚教育基金会”(DAAD-K. C. Wong Fellowship)、“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的资助,笔者得以先后于1998~1999年在联邦德国吕内堡大学、2002年在联邦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2002~2003年在美国哈佛大学从事了欧美环境政治的专题研究;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EYTP)、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青年教师基金(Fok Yingtung Education Foundation)和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成长基金”,则为本译丛提供了主要的财政资助。在本译丛编译过程中,除了安德鲁·多布森(Andrew Dobson)、斐迪南·穆勒—罗密尔(Ferdinand Müller-Rommel)、戴维·佩珀(David Pepper)、托马斯·波古特克(Thomas Poguntke)和克里斯·卢茨(Chris Rootes)教授的热情帮助外,还得到了柏林社会科学研究中心(WZB)的迪特·鲁赫特(Dieter Rucht)教授、欧洲议会的皮尔·加尔顿(Per Gahrton)博士和劳伦斯·范德瓦勒(Laurence Van de Walle)女士、哈佛—燕京学社的杜维明先生等的重要建议或鼓励。与此同时,国内同行余谋昌教授、周穗明教授、叶平教授、杨通进博士、雷毅博士和朱贵昌博士等,也以不同形式提供了学术帮助与建议。在此,笔者一并致以最真诚的谢意。

最后,笔者还应对给予本译丛大力支持的山东大学出版社表示感谢。希望这套丛书能够成为我们共同期待的环境政治学研究在中国进入一个新阶段的起点。

郇庆治

2004年12月于山东大学

作者简介

斐迪南·穆勒—罗密尔(Ferdinand Müller-Rommel),德国吕内堡大学政治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绿党、小规模政党和中东欧政治,相关著作有《西欧新政治:绿党和选择性名单的兴起》、《西欧绿党:发展阶段和成效原因》、《新政治》和《社会科学视野下的环境政治》等。

托马斯·波古特克(Thomas Poguntke),英国基尔大学政治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绿党、新政治和政党政治,相关著作包括《选择政治:德国绿党》、《基于反政党情感的政治》和《变化中的政党组织:社会归属与组织适应的欧洲比较》等。

译者说明

选择并翻译由斐迪南·穆勒—罗密尔和托马斯·波古特克教授主编的《欧洲执政绿党》(Green Parties in National Governments)一书,首先是基于它讨论的主题所体现的欧洲绿党发展的划阶段重要性和它所提供的国际比较视角下对欧洲主要执政绿党 1995~2002 年执政经历及其政策与政治影响的开拓性探讨。因而,本书在某种程度上并不仅仅是对 1995 年起先后步入全国政治权力核心的芬兰、意大利、法国、德国和比利时绿党在第一个执政任期内管治绩效以及政治得失的个例性归纳和比较,还是对欧洲绿党自 20 世纪 70 年代初产生以来的发展历程及其在最新阶段所面临的主要挑战的全面分析。

译者曾经先后两次在斐迪南·穆勒—罗密尔教授的指导下从事欧洲绿党的专题研究工作(1998~1999 年在吕内堡大学、2002 年在杜塞尔多夫大学)。期间,译者还有幸多次见到了托马斯·波古特克教授,共同探讨对欧洲绿党与环境政治发展的看法。这些经历既使我加深了对这两位学者在环境政治特别是绿党政治方面观点的理解,也使我亲身感受了他们对一位来自中国的年轻学者的关爱与鼓励,包括本书纳入《环境政治学译



丛》之一的翻译出版。因而,如果本译稿能够较为准确地体现了两位学者以及章节作者的思想,那当是我对他们为此所付出的巨大努力的最好感谢。

在翻译体例上,尽可能地忠实于原著是译者坚持的基本原则,个别地方可能因此不太符合中文习惯。为了读者阅读的方便,译者还对首次出现的人名和地名提供了其英文或母语的拼写。主要的局部性调整包括:一是将文中分列的注释与参考文献合并成了国内读者比较习惯的章末注方式,而且基于语言等方面的考虑对其中的个别注释做了省略处理;二是在涉及个别性绿党的选举资料时,译者添加了它们自2002年至2004年初的相关数据;三是在保持附录I绿党研究文献的初始语言的同时,根据欧洲绿党联盟(EFGP)网站2004年初的资料对附录II中它的成员党信息做了更新。

最后,译者要感谢山东大学国际政治与英语专业2001级的杜吉涛、李昕蕾、单琳琳、王慧慧和王永刚对本译稿所做的校对工作和提出的修改建议,而对于定稿中很可能依然存在的诸多谬误之处,则理应由译者负责。

译者

2004年6月于山东大学

中译本前言

当本书的英文版于2002年出版时,绿党在西欧国家政府中的参与程度已经达到了它的顶点。在第二个千年结束时,它们曾经是五个全国政府中的成员。芬兰绿党最先于1995年加入了一个广泛的、超大规模的联盟,一年之后是意大利绿党,然后是它们的法国同伴于1997年加入。可以认为,更重要的是德国红绿联盟政府于1998年的形成,它使得绿党第一次在西欧成为联盟政府中的一个主要角色。一年后,2个比利时绿党被接纳进政府,使拥有绿党内阁部长的西欧政府数量上升到5个。到2002年,它们已经失去了在意大利和法国的内阁职位,而又过两年后的今天,只有德国绿党成功地保持了其在全国政府中的地位。

这是否意味着西欧绿党不再是一支值得重视的政治力量呢?无疑,政府参与是我们评价一个政党家族政治实力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在多党体制下,即使选举成功的政党仍然有可能被排斥在政府之外,如果政党体制的整体构型不利的话。因此,如果我们想评估一个政党家族的总体意义,观察其选举结果的演变是一个同样重要的指标。就此而言,绿党看起来是更为



稳定的。当然,它们在不同国家中有着不均衡的选举表现,但从总体上说它们都维持了在全国政党体制中的地位和它们的执政潜力。事实上,唯一的例外是比利时的佛莱芒绿党(AGALEV),它在2003年全国大选中只获得了2.5%的选票并丢掉了所有的议席。它在瓦隆地区的同伴生态党的表现也好不了多少,降至3.1%选票和4个议席。然而,卢森堡绿党在2004年大选中表现突出(11.6%选票、7个议席),芬兰绿党在2003年全国大选中增加了3个议席和0.7%的选票,而瑞士绿党得票在2003年大选中也从5%增加至7.4%(13个议席)。虽然在2003年大选中失去了1.9%的选票和2个议席,荷兰绿党仍然是一个离散化政党格局中相对稳定的力量。

这些结果清楚地表明,当前并不存在一种绿党整体衰弱的迹象,尽管显而易见的是,绿党不能再期待20世纪80年代时那样的增长率。那时,生态学与和平运动相结合的、整体上受到后物质主义价值取向激励的动力,为处于存在初期的它们提供了大量的能量。随着经济困难的增加、新社会运动的衰弱和“9.11”事件后公众对安全迅速增加的关注,绿党面临的总体政治气候明显地不像15年前那样有利。

然而,与此同时,西欧的很多绿党已经失去了基要主义的目标并转向政治实用主义。无疑,政府参与促进了这一温和化进程,而德国绿党是执政带来的温和化效果的突出例子。另外,这些经历也在2004年春在罗马正式成立的欧洲绿党(EGP)框架内得到表现。这已使得西欧绿党成为一个更能被接受的政府党,因而可以预测的是,只要大选后的西欧政党体制整体构型适宜,绿党将会回到全国政府中去。

甚至在离开政府后,绿党继续在对它们国家的政策发挥着持久影响。正如本书中的评论家清楚阐明的那样,执政的一个



最重要方面之一在于改变行政当局工作方式的能力。首先,重组各部和政府机构中的高级职员可以做到这一点。其次,涉及现存法律落实的新程序可以对全国政府的政策产生持久影响。当然,这些变化可能会被后来的政府所逆转,但政府是具有高度依赖性的。重组政府部门、任命高级职员和重新制定法规,都需要时间。换句话说,甚至在失去它们除德国政府之外的职位后,西欧绿党继续对国家管治有着值得关注的影响,而且,它们也许会在不太久的将来在一个或几个国家中回到权力平衡者的地位。

斐迪南·穆勒—罗密尔、托马斯·波古特克

2004年9月于吕内堡大学/基尔大学

前言

大约 30 年前,关于个体价值的研究表明了西方公众中出现的、渐进但确信无疑的向后物质主义价值取向的转向。在几年的时间里,第一批绿党市镇议员和区域议员当选,不到 10 年,很多欧洲国家的绿党成功地在全国大选中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以所谓“寂静的革命”(silent revolution)开始在制度政治中显现出来,并策略机智地从地方起步,迅速地移向全国议会。绿党的出现与成功看起来与公众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转向相关。现在,大量的经验比较研究都表明,绿党除了内部的某些右翼少数派外,大都反映了这一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变化。比如,绿党活动分子和投票人的社会基础、绿党的意识形态、绿党的组织和绿党的抗议政治偏好等,都与后物质主义的根本性特征完全吻合。

然而,当一些比较成功的绿党开始进入西方国家的执政联盟的时候,我们并不清楚的是,后物质主义的价值理念经过这样一个“向制度内部进军”(march through the institutions)之后在多大程度上仍然幸存了下来。在德国,一位年轻时候曾经激烈反对北约的绿党外长主持通过了德国参加的西方军事干预行动。那么,全国政府中的绿党能够做到在政府议程中注入一些



关键性的后物质主义目标吗？因为无可避免的是，任何选择加入政府的社会运动都会失去其某些最初改革主义甚至革命性的决心。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历史经验已经证实了这一点，而并非偶然的是，欧洲绿党内部“基要主义者”(fundamentalist)和“现实主义者”(realists)的某些痛苦争论使人联想起近一个世纪前社会民主党内部的类似争论。尽管如此，任何具有一定规模的新政党都会对一个国家的政治与政策产生某种影响，因为它将迫使其他竞争性政党回应这一新挑战，而当这个新政党能够进入政府时就更是如此。

尽管关于绿党的著述已经有很多，但人们对它们在政府中执政成就的分析迄今为止还相对较少。绿党的选民分析已十分丰富，大多集中在绿党的内部组织与政治战略、绿党活动分子的形象特征与动机，而关于绿色政治思想的论述也已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但对于绿党执政后是否在实践中它们的绿色理想与观念的注意却非常有限。

这本关于全国政府中的绿党的论文集是一个试图弥补我们这一知识领域缺陷的独特而重要的步骤。它是第一个对这些议题基于系统性和经验性视角的比较研究。它通过考察联盟政府组成的过程、绿党在政府中的行为、绿党对政府政策的影响和加入联盟政府对绿党选民与组织稳定性的影响，提供了对后物质主义价值变化的制度效果的深刻见解。换句话说，它力图回答的是全国政府中的绿党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改变这些国家的政策。

对绿党执政初期绩效分析的结果是多重性的。它们的大多数激进要求被迫隐藏了起来或者根本没有被提出。考虑到它们有限的选举支持和政府中的谈判能力，这一结果并不奇怪。尽管如此，正如这一研究表明的，绿党在不太引人注目的行政管理

水平和政策落实中取得了令人吃惊的成功。通过获得接近政府的机器,绿党已经带来了远大于初看起来那样的巨大变化,甚至对一个已经有所了解的观察者来说也是如此。

总之,这一优秀的论文集刻画了既存化的制度政治内在的保守主义如何有助于维持现状。从一开始,那些进入政党政治的后物质主义者如果要在选举中取得成功就必须约束他们的要求,而他们一旦获得了某些政治职位便面临着一系列制约其改革空间的系统性限制。这一研究还清楚表明,一个抗议性运动一旦选择了参与制度化政治,组织、战略和熟练的政治家就具有了极端重要性,如果它想对全国性政治产生持久性影响的话。个体水平价值观变化上的“寂静的革命”也许已经根本改变了西方公众的信仰系统,但它还没有深刻改变西方民主制下的既存化政治制度。当然,通过创建一个绿党可以由此成长的环境,它将对西方社会的政党政治和政策制定产生实质性和持久性的影响。

罗纳德·英格利哈特

目 录

译者说明	(1)
中译本前言	(1)
前 言	(1)
导论 生命周期理论与西欧绿党的政治绩效	(1)
1. 作为有机性组织的政党:绿党的“生命周期”	(3)
2. 作为自动力组织的政党:绿党的“政治绩效”	(7)
3. 作为有机性与自动力组织的政党:某些初步假定	(13)
4. 全国政府参与:分析框架	(14)
第一章 芬兰绿党	(19)
1. 芬兰的选举与政党	(21)
2. 走向政府:1991 年大选后的绿党	(23)
3. 1995 年进入政府(利波宁 I)	(25)
4. 1999 年留在政府(利波宁 II)	(29)
5. 政府内的战略	(31)